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文化篇)

主编：王瑞璞

上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文化篇)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张湛彬
- 副 主 编 孙建军 姜 宏
- 郑 毅 刘景云
- 编辑部主任 张国华
- 编辑部成员 王虎江 王 虹
- 孔艳春 杨 林
- 胡燕欣 徐展鹏
- 程建华 张 楚
- 张艳玲 索 杰
- 侯玉智 程建刚

目 录

国旗、国徽、国歌、国名、国庆日细细敲定 …………… (1)

☆毛泽东曾定1950年1月1日为国庆日

☆周恩来拍板定国名

☆毛泽东：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国徽的设计者到底是谁

一代领袖毛泽东奠定新中国文化基调 …………… (28)

☆毛泽东景仰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他为戏剧改革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泽东后的戏剧复苏与繁荣

☆他对古典文学总的态度是批判

☆“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

中共中央郑重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 (110)

☆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出版选集

☆毛泽东主持《毛选》的编辑工作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为主要成员

☆《实践论》在苏联出版的内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82年停止发行

电影战线的“花好月圆”和“暴风骤雨” …………… (123)

☆毛泽东看完影片说：“再放一遍”

☆周恩来、朱德肯定电影《武训传》

☆最先被康生“拔白旗”的是《花好月圆》

☆人民日报盯上了《北国江南》

☆《早春二月》里夏衍丢了官

☆他向陈荒煤、陈鲤庭等提出“两条腿”走路

☆“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意在“清理门户”…… (171)

- ☆“‘小人物’做起来的‘大人物’不注意”
- ☆毛泽东的信件摆在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 ☆冯雪峰在大来头“质问”下公开检讨
- ☆郭沫若着重强调要扩大斗争的范围
- ☆批俞平伯意在清理胡适文化思想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开新中国文化批判先河…… (187)

- ☆毛泽东断语：胡风“不得了”
- ☆1950年文坛进入了批评的季节
- ☆舒芜“反戈一击”胡风陷入困境
- ☆周扬让胡风“应该检查‘生活态度’”
- ☆“三十万言书”的灰色结局
- ☆中共中央两次给胡风平反

文化老人梁漱溟在政协会上与毛泽东的争论…… (210)

- ☆“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
- ☆毛泽东：“你却是以笔杀人的”
- ☆毛泽东不给梁漱溟“雅量”
-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
- ☆梁漱溟闭门思过躲过“右派”帽子

批错马寅初《新人口论》导致人口政策上的失误…… (228)

-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
- ☆毛泽东：“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 ☆陈伯达突然点名：“马老要作检讨”
- ☆康生插手，学术讨论变成政治批判
- ☆马寅初：“我只得唱‘独角戏’”
- ☆“错批马寅初，误增3亿人”

“双百”方针的提出带来“早春的天气”…… (249)

- ☆毛泽东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

☆他说：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周恩来评论费孝通的文章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多次强调“放”

毛泽东关注学术研究参加《光明日报》的讨论…………… (266)

☆毛泽东：我看《光明日报》就看专刊

☆“林克：请将《第6辑》购买一部给我为盼”

☆他鼓励周谷城：不要怕，写文章继续讨论

☆文、史、哲学者、专家和艺术家的园地

☆“你敢登，我就敢画”与“你敢画，我就敢登”

文艺界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制作”过程…………… (299)

☆周恩来指示：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

☆邓小平：“意见不一致……去讨论好了”

☆彭真说：周扬也要翻案吗？

☆丁玲对结论不能接受

☆张际春、李之璠质问周扬

康生炮制的小说《刘志丹》错案株连甚广…………… (320)

☆毛泽东：“此案审查已久。建议免于追究。”

☆邓小平批示重新复查此案

☆康生断定“看来是有政治倾向性的”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指责是幕后策划者

☆《刘志丹》的酝酿过程与习仲勋没有关系

“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在全国的兴起…………… (332)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周恩来、邓颖超灯下谈雷锋经过

☆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雷锋太好了！”

☆“雷振兴，他为什么要改名呢？”

☆他是中央级党报的通讯员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借古讽今…………… (368)

☆毛泽东赞同郭沫若为高纬王平反

☆“这个案要翻,不能贴他的大字报”

☆“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祖出身”

☆他讲项羽失败有三个教训

☆毛泽东赞成刘邦会用人

☆他在《后唐灭梁》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

毛泽东博览群书探询治国良策…………… (396)

☆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他对《辞海》《辞源》不满意

☆毛泽东与李政道讨论“宇称不守恒”

☆临终前,他读了七分钟书

文人毛泽东与文化名人的盖世情结…………… (410)

☆毛泽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李苦禅酒醉上书毛泽东

☆颇得毛泽东赏识的侯外庐

☆《李自成》面世的前前后后

☆《甲申三百年祭》到诗词唱和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编导周恩来…………… (499)

☆周恩来亲笔把“绝路”改成“歧路”

☆他着后赞许说:这艘船设想得好

☆总理敲定3个方面军会师的《会师歌》

☆“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

☆他说:陈老总也觉得没有这首歌太可惜了

国旗、国徽、国歌、国名、国庆日细细敲定

- ☆毛泽东曾定 1950 年 1 月 1 日为国庆日
- ☆周恩来拍板定国名
- ☆毛泽东：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 ☆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 ☆国徽的设计者到底是谁

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

国徽、国旗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制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由第六小组设计。参加第六小组的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共 16 人。7 月 4 日，第六小组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1)公开征求，(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关于公开征求，第一次小组会上就拟定了征求条例，随即登报并定 8 月 20 日为征求截止期。关于两个评选委员会，当时小组会议上决定：除由本组组员分别参加外，并聘请专家参加。后来(8 月 5 日，第六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

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参加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截至9月14日,第六小组共开过全体会议4次,座谈会若干次。又为了便利本组组员及专家选阅甚多之应征来稿,自8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饭店四一三号会客室特设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来稿集中陈列。

自登报征求后,社会上的反应非常热烈。一个月内,收到应征稿件,统计如下:

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

国徽:112件,图案900幅。

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意见书(不附图案或词谱者):24封。

上列来稿,其中有58件为二人以上之集体作。一人所投之稿,往往包括图案两个以上,乃至十余个之多,例如国旗应征稿件为1920,而不同之图案实数则为2992,多出1000余个。

再就应征来稿之地区分布而言,其范围之广,可以说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现在分类统计如下:

北平	411
东北	435
上海	391
天津	140
江苏	145
浙江	142
河北	120
南京	107
山东	128
河南	61
武汉	61

青岛	54
安徽	47
江西	28
山西	29
西安	29
陕西	22
湖南	8
热河	7
内蒙	6
绥远	3
香港	63
美洲	23
马来亚	4
澳门	4
北朝鲜	5
印尼	3
待解放区	4
其他及不明地址者	289

至于投稿者的职业、性别、年龄及所属阶层,还没有作出精密的统计。仅言其大概,则有小学生,也有仍用文言作说明并且引用了古书的老先生,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关关职员,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而来自解放军各部队机关的投稿 87 件。大抵来自各老解放区的投稿,以工人及机关职员为最多,学生及农民次之;而来自新解放区的投稿,则以自由职业者为最多。总而言之,从这一次的国旗、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上,充分表现了全国(还有国外华侨)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上,男女老幼,对于革命政权如何的热烈拥护,对于新中国的

国旗、国徽、国歌之制作又如何的关心，如何踊跃地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第六小组深感其责任之重大，不敢掉以轻心。全组组员及参加两个评选委员会的专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审阅，就国旗国徽图案，得出了初步意见，简述如下：

一、国旗国徽图案征求条例，提出应注意各点为：(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国旗图案以庄严简洁为主，国徽则须庄严而富丽。应征稿件就上述注意各点构思设计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为镰锤交叉并加五星者，此类最多，其中并有变体，例如镰锤有国际式(即苏联国旗上所用之形式)与中国式者，有将镰锤置于五角星之中，或将旗之左上方作白色或蓝色而置镰锤或五角星于其中者。第二、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或不加五角星者，此类亦有多种变体。第三、为以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者。第四、为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二、上述四类，其第一类用国际式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者，无论其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至于拟用中国式镰锤或其他农具以代镰刀的图案，则因布置困难，形式上既不美观，而模仿的意义依然存在。

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很难配合得当，故亦难以美观，且图面复杂，与“简洁”之旨不符。

第三类的形式，一半模仿美国国旗，又一半模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

第四类长处是简洁,这一类中,红色旗面三分之一处加黄色长条而以五角星位于左上角,这一个形式,较其他各式似乎更好些(如复字第一号);盖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黄色长条则可以代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

三、国徽图案的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因为应征者多把国徽想像作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合于国徽体制的来稿,其中又有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的。比较可供参考采择者,仅四五式。

这就是第六小组审阅评选国旗国徽图案的初步意见。人民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审查了这些初步意见后,未作最后决定。9月16日,人民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决议:“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原来负责的小组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根据此项决议,除国歌一项工作,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

(马叙伦 沈雁冰)

国庆日的确定

有关国庆日的确定,当初是有过一番讨论的。

毛泽东曾选定1950年1月1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日。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重新开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的结果,新中国采用世界统一的纪年方法。那么,国庆日定在一年的开始,就是很吉利的了。人们希望从一年伊始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然而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从毛泽东遗留下的文件看,计

划赶不上变化的例子并不鲜见。早在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第二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九月会议,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1948年10月中央九月会议通知,宣布1949年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两个月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个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预言中国和平的实现只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此时,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和平津战役正在进行。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已占优势,而且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北平和平解放前四天,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北平天津解放口号。第三十三条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0月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一次会议上,由马叙伦委员提出建议,请政府明确规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10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林伯渠秘书长在前一天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林伯渠说,10月10日是可纪念的一天,但是这一天已经不能做为中国的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规定新的国庆日。这将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规定。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成果又被蒋介石篡夺。现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已经获得成功,旧中国已经死亡,新中国已经诞生,应当有新的国庆日。全国人民及国外华侨,如有在10月10日开纪念会的,应当允许。但不应当以这一天当做国庆日。

国名的斟酌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辞。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历时5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中,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是第四小组。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

我国国名以可将原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他们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的共和国

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

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四小组的工作,他说,第八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了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等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

的报告。

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上，去掉民主二字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国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在内。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国两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在外国，共和和民主是一个字，而在中国，却将它定为两个字了。

国名就这么确定了。然而与之相关的国名简称又让会议代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本来中国的原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不完全，可以双关的解释，而且很费解，不如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可能是旧民主主义。而今天是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为了要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国名是从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到：“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十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作为东道主，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占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稍稍停顿了，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紧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途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族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语音响亮，激动得满面红光。听者报以热烈的掌

声，全然冷落了一桌丰美的菜肴。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华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法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之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称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说话间，大家已经用好午餐。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自9月27日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1949年7月14日到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